



近代东北移民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

李亚婧 李楠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农村入户调查,对近代东北移民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东北地区作为近代边疆移民迁入地,家庭人口结构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在家庭类型和人口规模方面,具有规模大、分家晚的特点,而且直系和复合家庭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性别比例方面,虽然东北地区总体性别比与全国基本持平,但是在“北满”地区性别比较高,存在性别比失衡现象;在年龄结构方面,青壮年人口比重较高,因此家庭内部拥有更高的劳动力比例;在经济身份方面,农业依然是主要就业方向,但“南满”地区非农就业比例高于“北满”地区。针对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发现东北地区特定的边疆经济结构和移民社会特征是影响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不仅对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对近代边疆地区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乡村社会 东北移民 家庭人口结构

一、引言

近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的研究,对于理解近代中国人口转型和传统乡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等我国内地核心区域,^①对于边疆地区人口特征,特别是作为近代移民流入地的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家庭结构及人口情况缺乏微观深入考察。

根据高鹏程(T. R. Gottschang)的估计,近代东北移民从1890至1942年每年人口流动近50万,净人口流入超过800万,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人类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之一,而且对近代东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②然而,尽管该历史事件非常重要,但在现有的关于近代东北地区移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的研究中,却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有些学者虽然对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进行了相关考察,但一方面观测层面过于宏观,另一方面分析缺乏系统性,并且未对导致这一家庭人口结

[作者简介] 李亚婧,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南京,210023,邮箱:yajingli@nufe.edu.cn。李楠(通讯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邮箱:nanli@fudan.edu.cn。

*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疾病与经济发展:基于近代中国流行性鼠疫空间扩散的理论及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1773070),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I高峰计划项目“整治整合、民族认同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资助。

① 例如,李景汉对定县农村社会调查,考察了定县乡村人口规模、年龄、性别以及家庭大小等情况(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费孝通在江村调查,考察了江村农村家庭的基本情况(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跃生根据冀南农村的调查,专门探讨了冀南农村家庭人口、结构、类型等问题(参见王跃生《民国年间冀南农村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Thomas R. Gottschang, “Economic Change, Disasters, and Migration: The Historical Case of Manchu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5, No. 3, 1987, pp. 461–490; Adam McKeown, “Global Migration, 1846–194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5, No. 2, 2004, pp. 155–189.



构特征的内在决定因素进行考察；^①二是另一些学者虽然利用微观户籍数据提供了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的微观信息，但所考察的时间主要集中于晚清时期，难以展现近代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的动态历史变迁。^②因此，关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移民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伪满洲国农村实态调查数据以及地方志等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移民家庭人口结构^③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研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化的考察。研究发现：（1）从家庭人口规模来看，东北地区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6.6人，高于全国平均人口水平，而且“北满”地区家庭平均人口高于“南满”地区。^④（2）从家庭类型结构来看，东北地区乡村家庭结构中直系家庭与复合家庭在移民社会家庭结构中仍占有较高比例，东北地区具有家庭规模大与分家较晚的特征。（3）从家庭性别比例来看，东北地区家庭性别比为107，基本与全国水平持平。其中，“北满”地区家庭性别比为113，“南满”地区家庭性别比为103。“北满”地区作为后开发地区，家庭性别比高于“南满”地区，家庭内部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4）从家庭年龄结构来看，东北地区移民乡村家庭主要以15—50岁的青壮年为主，这意味着东北地区移民社会与其他地区相比，家庭内部拥有更高的劳动力比例；（5）从家庭经济身份来看，尽管农业依然是主要就业方向，然而“南满”与“北满”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南满”地区拥有更高的非农就业比例。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这与东北地区自身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地理特征密不可分。最为重要的是边疆地区人少地多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家庭人口结构及生产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了抵抗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农户需要维持较大家庭规模和较高男女性别比例以抵抗农业生产和生活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较大的家庭规模、较高的男女性别比例以及较为年轻的年龄结构，也可以保证农户在农业生产上具有规模效应，有利于在边疆地区定居生产。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文系统化地利用民国时期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微观入户调查数据以及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资料，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东北地区乡村移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进一步丰富了近代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家庭人口结构方面相关领域的研究。其次，通过对东北地区乡村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近代边疆地区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揭示了边疆文化对家庭结构、人口规模等方面的作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近代东北地区的移民开发与移民乡村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主要对伪满洲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提供的样本和东北地区移民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情况进行分析说明和系统性考察；第四部分，主要针对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的影响因素进行讨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历史背景：东北移民、开发与乡村社会的形成

历史上的东北地区，地域辽阔，不仅包含现在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同时也包含了内蒙古东

^① 例如，范立君回顾了近代东北移民发展的过程，分析了东北移民的动因，以及对移民年龄、性别、职业、阶级结构等方面的整体考察（参见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高乐才，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整个移民人口、分布与结构进行了宏观考察（参见高乐才《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赵英兰对清代东北的人口数量、性别结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婚姻家庭的宏观研究（参见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② 例如，康文林和李中清根据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资料，考察了1789—1909年辽宁分家的原因和家庭状况，其中涉及对东北地区家庭规模和结构的探讨。Cameron Campbell and James Le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ousehold Division in Northeast China, 1789—1909”, 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③ 按照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定义，家庭人口结构一般指家庭人口构成，根据不同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可以把人口划分为不同的组合结构，本文主要从家庭人口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类型结构和经济身份等几个重要方面进行考察。

^④ “南满”与“北满”分别是对伪满洲国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的简称，“南满”“北满”为历史地理区划，主要根据日俄战争后，俄国与日本势力控制范围划分，以吉林长春为分界线。长春以北俄国控制中东铁路地区为“北满”地区，长春以南日本控制“南满”铁路地区为“南满”地区。具体划分参见 Bank of Chosen, *Economic History of Manchuria*, Seoul: Bank of Chosen, 1920, pp. 11—12, 16—17。



部以及部分河北东北部地区。^① 由于东北地区属于高纬度地区,气候条件恶劣,自古以来地广人稀,主要是满、蒙等各少数民族聚集地。^② 顺治元年(1644)满清入关后,在辽东地区实行了招民开垦政策,特别是顺治十年,清政府特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以奖励和补助的办法招募关内农民到东北开垦。^③ 但从康熙七年(1668)起,清政府以东北为“龙兴之地”为由,为防止关内汉人自由迁入东北,废除辽东招垦令,对“边外”地区进行封禁。到乾隆五年(1740),清政府颁布封禁东北的法令,禁止关内人民入关,对东北地区实行长达近200年的封禁政策。^④ 尽管这一时期不断有移民违禁闯入东北地区,但东北地区在19世纪中期之前仍处于未开发状态,人口密度极低。据统计,顺治十八年,奉天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04人,仅是山东省人口密度的3‰。即使到19世纪初,根据《嘉庆一统志》记述,奉天省人口为175.7万人,吉林省人口为56.7万人,黑龙江省人口为16.8万人,全部人口不足全国的7‰。^⑤

东北地区正式的人口增长与边疆开发始于19世纪中叶。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进一步加深。在中国东北地区,沙皇俄国分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侵占大量土地。与此同时,又通过《天津条约》,将牛庄作为通商口岸,至此,西方列强可以通过辽河深入东北地区腹地。严重的边疆危机使清政府感到移民实边的重要。此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失利,使清政府陷入巨额赔款的财政危机之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也加速了东北地区开发的进程。^⑥ 因此,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开始局部弛禁政策,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制定了《呼兰放荒章程》。咸丰十一年,又开放了吉林西北草原,招垦开荒,允许关内农民迁往东北,揭开了近代东北大移民和东北开发的序幕。^⑦

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为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开发提供了较好的契机,而关内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的人口压力、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以及东北地区自身的经济特征也为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提供了动力。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从明朝万历时期的1.5亿上升到乾隆时期的3亿,增长1倍。^⑧ 华北地区迅速成为除长江三角洲之外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⑨ 在华北地区人口增加的同时,耕地面积并没有显著提升,这导致人均耕地迅速下降,从明代的人均15亩下降到清朝末期的3.1亩。^⑩ 人多地少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这一方面导致了“内卷化”,另一方面也成为东北移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人口压力外,华北地区在晚清时期也不断面临着天灾人祸的威胁。据统计,道光三年(1823)至宣统三年(1911)间,山东、河北和河南三省受灾数达7400多个县次。其中山东、河北两省有67万多个村庄次。^⑪ 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之后的军阀混战,也使得原本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华北人民更加民不聊生,四处逃亡。^⑫ 以上这些

① 清代东北地区设置奉天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九·一八事变”前民国时期东北地区设置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省,伪满时期东北又经历了多次政区变迁。《清史稿·地理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其中,满族主要居住在东北中部,蒙古族分布在东北的西部,朝鲜族多活动在吉林延边地区,而其他少数民族,例如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喀等则分别分布在大兴安岭以及黑龙江中下游流域。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第57页。

③ 吕耀曾等修,魏枢等纂:《盛京通志》卷23《户口志》,清乾隆元年刻本,第1页。

④ 《清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17页。

⑤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4页。

⑥ 高乐才:《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第105—113页。

⑦ 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⑧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⑨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⑩ 徐浩:《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⑪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6页。

⑫ 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 - 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因素形成了华北地区大规模人口向东北地区迁移的重要推力。除此之外,东北地区自身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华北移民流入东北地区。主要表现为: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北铁路网络迅速发展,特别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以及京奉铁路的建设,东北铁路网络迅速形成。^① 铁路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跨地域的流动,东北地区铁路里程每增加1公里,铁路运力就会带来比传统海运高出12%的人口流动。^② 二是自20世纪初开始,东北大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大豆贸易的开展使广大东北地区从事大豆种植的农户经济水平迅速提升。^③ 这也成为东北地区吸引大量关内人口迁移的重要经济拉动力。

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闯关东”大规模人口迁移后,东北地区的人口规模迅速增长。^④ 据估计,清军入关时辽东人口不超过30万人,^⑤即使到1850年,东北地区总人口也不超过300万人。但随着清政府实行弛禁和移民实边,移民人口规模不断增加,截至20世纪40年代初,东北地区总人口超过4000万人(见图1)。人口总量从1850年至1940年增长了近20倍,年均人口增速达3.4%。根据艾克斯坦等估算,在增长的人口中,仅有三分之一是自然增长,其余三分之二均来自移民群体。^⑥ 因此,东北地区乡村社会也被打上了移民社会的烙印。移民特征对近代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乡村社会的家庭人口结构具有较为独特的地域特征。乡村社会不仅以大家庭为主,而且在人口聚落上,形成了“以同族同姓为基础”的“窝棚”“屯”“庄”“堡”等村落称谓。^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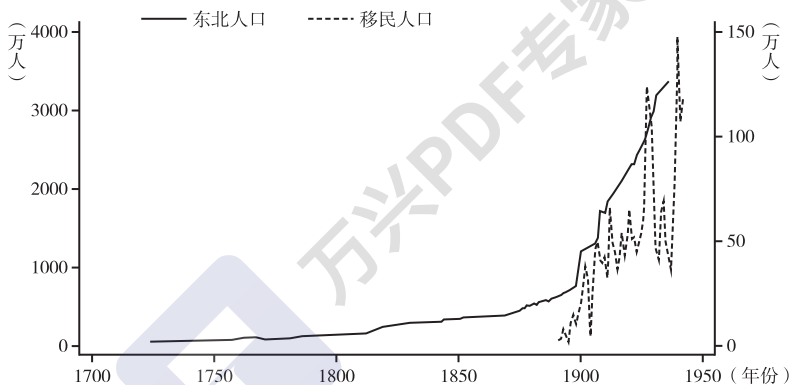


图1 18世纪至20世纪东北地区人口和移民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移民人口数据来自高鹏程(Thomas R. Gottschang, “Economic Change, Disasters, and Migration: The Historical Case of Manchu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5, No. 3, 1987, pp. 461 - 490);东北人口1724—1911年数据来自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1912—1940年数据来自朱惠方、董一忱《东北垦殖史》(从文社1947年版)和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改造社1933年版)。

① 东北铁路总里程从19世纪末的65公里累计增加至1935年的7635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91公里,成为当时中国铁路里程最长的地区。参见马里千等编《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李楠:《铁路发展与移民研究——来自1891—1935年中国东北的自然实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4期。

③ James Kai-sing Kung and Nan Li, “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s: The Effect of the Soybean Trade and Migration in Manchurian Villages, 1895 - 193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4, 2011, pp. 568 - 589;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1年版。

④ 高鹏程估计东北大移民净流入人口达800万人,是19世纪爱尔兰大移民人口的两倍,与1880—1950年美国“西进运动”移民规模相当。Thomas R. Gottschang, “Economic Change, Disasters, and Migration: The Historical Case of Manchu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5, No. 3, 1987, pp. 461 - 490。

⑤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⑥ Alexander Eckstein, Kang Chao and John Cha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The Rise of a Frontier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1974, pp. 239 - 264。

⑦ 剑虹:《汉族开拓满洲史》,《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第240页。



三、近代东北地区移民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所做的《农村实态调查》^①为主要数据来源。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为了全面了解东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情况,制定“满洲产业五年发展计划”,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局分两次以自然村为单位,以农户为调查对象,对东北乡村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活进行普查。这是该调查产生的历史背景。该调查第一次始于1935年,主要选取“北满”地区16个县19个村;第二次调查则于1936年主要集中在“南满”地区和极少部分“北满”地区(不包括在第一次调查中)进行,共涉及21个县22个村。因此,两次调查涵盖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样本总计涉及37个县41个村1776户农户信息。

该调查具有样本地域覆盖广、内容全面的特点。在调查范围上,不仅包括“北满”地区,而且也包括“南满”地区的农户。在调查内容上,涉及农户家庭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特征,既包括以县为单位的“农村实态一般调查”,即被调查村庄所在县的总体情况介绍,也包括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实态户别调查”,即调查村庄中每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农村实态专项调查”。^②而且每次调查均包含16张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农家概况表(农户职业、家庭成员、房屋和土地数量)、农家略历表(农户的移民史)、农家人员表(家庭成员数量、性别和年龄)、被佣劳动表、雇佣劳动表、土地关系表(拥有土地数量和来源)、建物大农具表、饲养家畜表、雇佣关系表、小作关系表、公租公课表、作物别播种面积并收量表、主要农产物收入处分表、农产物卖却表、生活费现银支出表、贷借关系表和现金支出表。在调查的内容中,特别提供了关于农户家庭的家族关系、移民情况和人口结构等重要信息,这为分析和考察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移民家庭人口结构提供了非常难得且可靠的微观数据资源。在样本选取的方法上,由于当时伪满洲国治安和抗日力量的影响,样本村庄的选取并非随机抽样,而是选取离县城较近的村屯作为调查对象。但就样本选取的地点分布而言,依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不仅样本地域分布广、数量大,而且调查设计较为规范。特别是调查设计均由专业调查人员进行设计和实施,在单位度量方面,进行了统一单位换算,从而提供了数据的统一性和可比性。因此,该调查是近代农村调查中质量较高的数据之一。^③该调查内容较好地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经济社会特征,因此也是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的近代农村调查数据之一。^④

① 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农村实态调查》,康德图书印刷所1935、1936年版。

② 曹幸穗:《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③ 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一股农村调查热潮,代表性的有南京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农村调查、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农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费孝通的农村调查等。其中,卜凯的农村调查规模较大、范围较广,涉及22个省38256家农户,但调查内容偏重生产和技术,难以反映农村社会的家庭关系。而其他调查则范围较小且信息有限。关于民国时期农村调查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曹幸穗《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古今农业》1999年第3期;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④ 例如Ramon H. Myers,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Villages of Manchuria during th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4, 1976, pp. 591-620; Dwayne Benjamin and Loren Brandt, “Markets, Discrimination, and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Women in China: Historical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4, No. 1, 1995, pp. 63-104; Dwayne Benjamin and Loren Brandt, “Land, Facto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Historical Eviden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3, 1997, pp. 460-494; James Kai-sing Kung and Nan Li, “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s: The Effect of the Soybean Trade and Migration in Manchurian Villages, 1895-193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8, No. 4, 2011, pp. 568-589. Dan Li and Nan Li, “Moving to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Economic Effects on Migrants of the Manchuria Plague of 1910-1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63, No. 4, 2017, pp. 91-106. 李楠:《血亲网络对近代东北移民经济差异的影响:1845—1934年》,《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4期;李楠:《社会网络、连锁合约与风险规避:近代东北乡村无息借贷合约选择机制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李楠:《农业冲击、乡村借贷与童工使用:来自20世纪30年代东北北部乡村社会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林展:《阶级身份、互联性交易、季节性与民间借贷——基于民国时期北方农村家计调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为了进一步了解近代东北地区移民乡村社会的家庭人口结构,这里主要从家庭规模、家庭类型、家庭内部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经济身份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 家庭规模

家庭规模主要指家庭内部人口数量,这是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由于东北边疆地区直到19世纪中叶才逐步开发,早期移民家庭形态多聚居而成。因此,家庭规模一直维持在7人左右。^①清代东北地区家庭平均规模,高于当时关内核心地区“五口之家”的平均水平。^②进入20世纪,东北地区人口家庭规模依然没有显著变化。根据本文样本分析,到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家庭人口数量平均为每户6.62人。其中,“北满”地区家庭平均人口数量为7.13人,“南满”地区家庭平均人口数量为6.21人(见表1)。可见,尽管“北满”地区家庭人口规模高于“南满”地区,但无论“南满”地区还是“北满”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均与晚清时期家庭规模基本持平。

此外,与当时关内主要地区的家庭人口规模相比,东北地区也要明显高于华北、华东等地区。例如,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人口统计信息,1912年、1928年、1933年全国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5.3人左右。^③另外,根据李景汉等所做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④以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⑤等提供的微观证据,同期华北地区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在5人左右,华东地区家庭规模更小,平均为4人,这也远远低于东北地区家庭人口规模。

表1 东北地区移民乡村社会平均家庭规模

“北满”地区			“南满”地区		
村名称	农家(户)	家庭规模(人)	村名称	农家(户)	家庭规模(人)
海伦县后三马架子屯	52	6.85	洮南县大茂好屯	36	10.06
望奎县后四井屯	38	9.29	敦化县三台山屯	50	4.34
绥化县蔡家窝堡	45	8.84	磐石县冉家屯	40	5.38
庆城县张家烧锅屯	67	6.52	榆树县余家烧锅屯	34	6.56
呼兰县孟家屯	51	6.16	延吉县杨成村AB屯	49	5.94
巴彦县西太平庄屯	42	7.73	庄河县金厂屯	38	7.21
青冈县董家店屯	30	5.83	凤城县西门家堡子屯	47	6.49
兰西县石家围子屯	42	7.17	辽阳县前三塊石屯	77	6.40
安达县正四家子屯	24	8.38	辽中县黄家窝堡屯	59	6.53
肇州县张家大围子屯	62	7.66	盖平县陈家屯	57	7.88
富裕县七家户屯	19	7.37	新民县二道河子屯	91	5.63
富裕县李地房字屯	13	9.92	梨树县家油房屯	40	6.48
讷河县孙家井	34	7.12	西丰县德恩屯	39	9.46
拜泉县王殿元屯	33	6.18	海龙县孙家街屯	46	6.67
明水县郭殿仁屯	43	5.93	黑山县孙家窝棚屯	65	6.72
克山县程家油房	18	8.72	盘山县孟家铺屯	57	6.00
克山县胥家屯	25	4.96	丰宁县选将营子屯	79	4.77

① 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第238页。

② 余新忠:《中国家庭史·明清时期》第4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栾成显:《明清文书档案反映的农民家庭规模》,《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1期;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③ 民国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④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48页。

⑤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22页。



续表 1

“北满”地区			“南满”地区		
村名称	农家(户)	家庭规模(人)	村名称	农家(户)	家庭规模(人)
克山县李家店屯	9	8.11	宁城县和硕金营子屯	74	4.72
龙镇县帮办屯	34	8.59			
璦琿县松树沟屯	63	5.43			
桦川县陆家岗屯	32	6.94			
富锦县岳家屯	22	7.91			
“北满”地区	798	7.13	“南满”地区	978	6.21
东北地区	1 776	6.62			

资料来源: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农村实态调查》。

(二)家庭类型结构

按照社会学和人口学对家庭类型的划分标准,我们将样本划分为核心家庭、扩大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单人家庭、残缺家庭6个类型。^①表2给出了家庭结构类型的分布:核心家庭比重为41.8%,直系家庭比重为31.9%,复合家庭比重为17.5%。其中,“北满”地区核心家庭占38.5%,直系家庭占28.9%,复合家庭占20.3%;“南满”地区核心家庭高达44.5%,直系家庭占34.4%,复合家庭占15.1%。可以看出,“北满”地区和“南满”地区家庭结构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南满”地区核心家庭比重高于“北满”地区。但总体上,20世纪30年代东北农村家庭结构中扩大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表 2 东北地区移民乡村家庭类型结构

村庄名称	农家(户)	核心家庭(%)	扩大核心(%)	直系家庭(%)	复合家庭(%)	残缺家庭(%)	单人家庭(%)
海伦县后三马架子屯	52	42.3	0	38.5	17.3	1.9	0
望奎县后四井屯	38	26.3	0	36.8	34.2	0	2.6
绥化县蔡家窝堡	45	35.6	4.4	26.7	31.1	0	2.2
庆城县张家烧锅屯	67	37.3	4.5	40.3	17.9	0	0
呼兰县孟家屯	51	43.1	9.8	31.4	15.7	0	0
巴彦县西太平庄屯	42	42.9	7.1	19	28.6	0	2.4
青冈县董家店屯	30	53.3	3.3	30	13.3	0	0
安达县正四家子屯	24	12.5	16.7	29.2	37.5	4.2	0
肇州县张家大围子屯	62	33.9	3.2	37.1	25.8	0	0
富裕县七家户屯	19	36.8	5.3	36.8	21.1	0	0
富裕县李地方自屯	13	23.1	0	30.8	38.5	0	7.7
讷河县孙家井	34	35.3	0	32.4	26.5	2.9	2.9
拜泉县王殿元屯	33	48.5	12.1	30.3	6.1	0	3
明水县郭殿仁屯	43	46.5	2.3	30.2	18.6	0	2.3

^① 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同时也包括一对夫妇没有子女的家庭,或夫妇一方健在拥有子女的家庭;扩大核心家庭指夫妻双方及子女与其兄弟姐妹或亲戚组成的家庭;直系家庭(或称主干家庭)主要是由一对夫妻与其已婚子女及其孙子女组成的家庭,或夫妻一方健在与已婚子女及其第三代组成的家庭;复合家庭(或称联合家庭)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已婚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人家庭指鳏寡孤独,同时也包括未婚配单独居住的家庭;残缺家庭主要是指父母双亡,由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



续表 2

村庄名称	农家 (户)	核心家庭 (%)	扩大核心 (%)	直系家庭 (%)	复合家庭 (%)	残缺家庭 (%)	单人家庭 (%)
克山县程家油房	18	27.8	0	16.7	50	5.6	0
克山县胥家屯	25	56	4	20	16	0	4
克山县李家店屯	9	22.2	22.2	22.2	33.3	0	0
龙镇县帮办屯	34	52.9	8.8	23.5	14.7	0	0
璦琿县松树沟屯	63	52.4	6.3	27	7.9	0	6.3
桦川县陆家岗屯	32	56.3	0	21.9	15.6	0	6.3
富锦县岳家屯	22	27.3	9.1	36.4	27.3	0	0
“北满”地区	756	38.5	4.8	28.9	20.3	0.5	1.8
洮南县大茂好屯	36	44.4	0	25	30.6	0	0
敦化县三台山屯	50	52	10	24	2	4	8
磐石县冉家屯	40	52.5	5	22.5	15	2.5	2.5
榆树县余家烧锅屯	34	35.3	11.8	35.3	14.7	0	2.9
延吉县杨成村 AB 屯	49	44.9	2	44.9	8.2	0	0
庄河县金厂屯	38	26.3	5.3	44.7	23.7	0	0
凤城县西门家堡子屯	47	59.6	2.1	25.5	12.8	0	0
辽阳县前三塊石屯	77	41.6	2.6	37.7	16.9	0	1.3
辽中县黄家窝堡屯	59	57.6	3.4	18.6	18.6	0	1.7
盖平县陈家屯	57	38.6	0	31.6	29.8	0	0
新民县二道河子屯	91	44	0	45.1	7.7	2.2	1.1
梨树县家油房屯	40	40	2.5	40	12.5	0	5
西丰县德恩屯	39	23.1	0	41	35.9	0	0
海龙县孙家街屯	46	37	8.7	39.1	15.2	0	0
黑山县孙家窝棚屯	65	43.1	3.1	33.8	18.5	0	1.5
盘山县孟家铺屯	57	36.8	3.5	43.9	12.3	1.8	1.8
丰宁县选将营子屯	79	50.6	1.3	32.9	8.9	0	6.3
宁城县和硕金营子屯	74	55.4	2.7	28.4	8.1	2.7	2.7
“南满”地区	978	44.5	3.2	34.4	15.1	0.8	2
东北地区	1734	41.8	3.9	31.9	17.5	0.7	1.9

资料来源: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农村实态调查》。

说明:兰西县石家围子屯的数据缺失。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原因。清代以来,东北移民人口为了定居生存和抵御风险,聚族而居形成了大家庭形式,主要以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为主。^① 康文林和李中清根据清代盛京内务府人丁户口册资料,对 18—19 世纪东北辽宁汉军八旗人口的研究发现,近一半的家庭是复合家庭,占 47.9%,核心家庭只占 23.7%。^② 但随着东北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家庭出现分家而治的现象,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东北家庭结构逐渐呈现出向核心家庭转变的趋势。而相较于华

① 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第 240 页。

② Cameron Campbell and James Le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ousehold Division in Northeast China, 1789 - 1909”, 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第 1—31 页。



北、华东地区,清代华北地区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就几乎各占三分之一。^①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王跃生的研究,冀南农村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比重达40%以上,直系家庭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复合家庭占15%左右。^②类似地,清代华东地区也主要以核心家庭为主。^③到20世纪30年代,根据江村调查,江村家庭结构中的核心家庭和残缺家庭占51.3%,主干(直系)家庭为45.4%,联合(复合)家庭占3.3%。^④甚至有学者认为,小家庭已逐渐成为18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形态,核心家庭所占比例超过50%。^⑤可以发现,清代以来,东北地区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的比重要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呈现出分家晚的特征。

(三)家庭性别结构

根据卜凯对中国168个地区38256个农户的调查,1929—1931年全国性别比为108。^⑥表3给出了20世纪30年代东北乡村家庭性别结构的基本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在一个普通农户中,平均男性人口为3.01人,平均女性人口为2.82人,性别比为107,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与全国性别比例持平。但从地区分布来看,东北地区男女性别比例存在一定地区差异。其中,“北满”地区家庭男性人口平均为2.84人,女性人口平均为2.52人,男女性别比为113;而“南满”地区家庭内部相应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分别平均为3.15人与3.06人,男女性别比为103。可以发现,“北满”要高于“南满”地区,即“北满”地区性别比例失衡较为严重。

“南、北满”性别比例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北满”“南满”开发时间早晚有关,二是与两个地区的经济结构特征有一定关系。东北地区作为移民地区,移民人口中男子占有绝对优势。在东北移民早期,由于东北地理环境恶劣,闯关东的移民基本以男性为主,因此清代东北地区家庭性别比例失衡十分严重。据清末宣统年间调查统计,东三省的男女性别比例甚至高达125.9。^⑦然而,随着逐步开发,一方面第二代移民出生女性人口增加,另一方面后来移民携家带口,女性移民逐渐增多。据统计,1925年从大连登陆的东北移民中,妇女与儿童为2.5万人,占登陆人口的11.5%。到1927年,妇女和儿童的登陆人数增加至11.8万人,比1925年增加400%。^⑧这导致东北地区性别比逐渐降低,家庭内部男女性别结构得到一定的改善。^⑨但对于东北地区内部而言,“南满”与“北满”又存在一定差异。“南满”与“北满”地区开发时间不同,例如根据样本统计,“南满”地区所有村庄平均村龄为150年,而“北满”地区所有村庄平均村龄为50年,仅是“南满”地区的三分之一。“南满”地区比“北满”地区开发早,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相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北满”地区女性而言,“南满”地区女性的就业机会更大。由此导致总体上不仅东北乡村家庭性别比有下降趋势,而且“南满”地区性别比要低于“北满”地区。

表3 东北地区移民乡村社会家庭平均性别比例

村庄名称	农家 (户)	男性人口 (人)	女性人口 (人)	性别比 (%)
海伦县后三马架子屯	52	3.58	3.27	109
望奎县后四井屯	38	4.45	4.84	92

① 许檀:《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4期。

② 王跃生:《民国年间冀南农村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唐立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⑤ 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家庭结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⑥ 卜凯著,乔启明等译:《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年版,第525页。

⑦ 民国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第2页。

⑧ 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

⑨ 李强:《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高乐才:《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第172页。



续表 3

村庄名称	农家 (户)	男性人口 (人)	女性人口 (人)	性别比 (%)
绥化县蔡家窝堡	45	4.58	4.27	107
庆城县张家烧锅屯	67	3.12	3.40	92
呼兰县孟家屯	51	3.37	2.78	121
巴彦县西太平庄屯	42	3.93	3.80	103
青冈县董家店屯	30	3.47	2.37	146
安达县正四家子屯	24	4.33	4.04	107
肇州县张家大围子屯	62	4.03	3.62	111
富裕县七家户屯	19	3.68	3.68	100
富裕县李地方自屯	13	5.31	4.69	113
讷河县孙家井	34	3.79	3.32	114
拜泉县王殿元屯	33	3.45	2.73	127
明水县郭殿仁屯	43	3.09	2.84	109
克山县程家油房	18	4.89	3.83	128
克山县胥家屯	25	3.00	1.96	153
克山县李家店屯	9	5.11	3.00	170
龙镇县帮办屯	34	4.47	4.12	109
瑷琿县松树沟屯	63	2.78	2.65	105
桦川县陆家岗屯	32	3.63	3.31	109
富锦县岳家屯	22	4.00	3.91	102
“北满”地区	756	2.84	2.52	113
洮南县大茂好屯	36	3.71	3.76	98
敦化县三台山屯	50	2.60	1.74	149
磐石县冉家屯	40	2.78	2.60	107
榆树县余家烧锅屯	34	3.35	3.21	105
延吉县杨成村 AB 屯	49	2.84	3.10	91
庄河县金厂屯	38	4.08	3.13	130
凤城县西门家堡子屯	47	3.04	3.45	88
辽阳县前三塊石屯	77	3.26	3.14	104
辽中县黄家窝堡屯	59	3.37	3.15	107
盖平县陈家屯	57	3.82	4.05	94
新民县二道河子屯	91	2.76	2.87	96
梨树县家油房屯	40	3.33	3.15	106
西丰县德恩屯	39	4.49	4.97	90
海龙县孙家街屯	46	3.52	3.15	112
黑山县孙家窝棚屯	65	3.18	3.54	90
盘山县孟家铺屯	57	3.04	3.54	90
丰宁县选将营子屯	79	2.47	2.30	107
宁城县和硕金营子屯	74	2.57	2.15	119
“南满”地区	978	3.15	3.06	103
东北地区	1 734	3.01	2.82	107

资料来源：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农村实态调查》。

说明：兰西县石家围子屯的男女人口数据缺失。

(四) 家庭年龄结构

家庭年龄结构是指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本文将年龄组划分为 1—10 岁、



11—14岁、15—17岁、18—30岁、31—50岁、51—60岁以及60岁以上7个组别。表4反映了东北地区乡村家庭成员年龄结构主要以15—5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据一半比例,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和50岁以上老年人分别占36.9%和13.2%。从这一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到,东北地区家庭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的特征,这也意味着东北地区家庭拥有较高的劳动力比例。此外,从地区差异来看,在“北满”地区乡村家庭中,15—50岁的成年人超过一半,约占全部人口比重的51.4%;15岁以下小孩占36%;50岁以上老人仅占12.5%。而在“南满”地区的农民家庭中,15—50岁的成年人约占48.7%;15岁以下小孩占37.6%;50岁以上老人仅占13.8%。可以看出,“北满”地区家庭15—50岁青壮年比例要高于“南满”地区家庭。这不仅意味着“北满”地区家庭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也充分体现了“北满”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特征。

东北地区乡村社会的家庭年龄结构与关内地区乡村社会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根据1929—1931年乔启明针对河北等11省22处12456户的调查分析:15—50岁的人口比重仅为41.9%,15岁以下人口比重占36.44%,5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2.09%。^①由此可见,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家庭人口中15—50岁中青年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体现了东北作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边疆地区,大量男性年轻移民人口成为主要劳动力来源。而这也得到了同时代研究者的支持。^②

表4 东北地区移民乡村家庭年龄结构

村庄名称	农家(户)	1—10岁 (%)	11—14岁 (%)	15—17岁 (%)	18—30岁 (%)	31—50岁 (%)	51—60岁 (%)	60岁以上 (%)
海伦县后三马架子屯	52	28.7	7.0	3.9	25.8	20.2	6.5	7.9
望奎县后四井屯	38	31.7	9.9	5.1	22.1	20.7	6.2	3.7
绥化县蔡家窝堡	45	28.4	6.3	5.5	24.1	23.6	9.3	2.8
庆城县张家烧锅屯	67	25.6	8.7	5.5	26.1	21.7	5.5	6.9
呼兰县孟家屯	51	22.9	10.8	5.1	24.2	22.6	9.2	5.4
巴彦县西太平庄屯	42	25.9	11.0	6.6	22.1	23.3	8.5	2.5
青冈县董家店屯	30	22.9	9.7	5.7	24.0	22.3	8.6	6.9
兰西县石家围子屯	42	23.3	11.0	5.3	23.9	22.9	7.6	5.6
安达县正四家子屯	24	28.9	6.5	6.5	27.4	19.9	6.5	5.0
肇州县张家大围子屯	62	31.3	8.8	3.9	22.7	23.3	4.9	5.8
富裕县七家户屯	19	25.0	5.0	7.9	30.0	21.4	7.9	2.9
富裕县李地方自屯	13	38.8	3.9	0.8	27.1	18.6	7.0	4.7
讷河县孙家井	34	27.3	6.6	6.2	20.2	25.6	7.0	7.0
拜泉县王殿元屯	33	25.0	11.3	2.5	18.1	30.9	7.4	4.9
明水县郭殿仁屯	43	27.8	11.0	2.7	25.1	21.6	7.5	4.3
克山县程家油房	18	30.6	2.5	5.7	30.6	21.9	5.7	3.8
克山县胥家屯	25	17.7	8.9	4.8	23.4	25.8	12.1	7.3
克山县李家店屯	9	21.9	6.8	6.8	28.8	23.3	5.5	6.8
龙镇县帮办屯	34	23.3	5.8	6.5	23.6	26.0	9.2	5.5
瑷琿县松树沟屯	63	27.2	9.6	3.5	22.5	20.5	9.9	6.7
桦川县陆家岗屯	32	32.0	9.9	5.4	23.0	17.6	8.6	3.6
富锦县岳家屯	22	27.0	13.2	8.0	19.0	23.0	5.7	4.0
“北满”地区	798	27.3	8.7	5.1	23.8	22.5	7.5	5.0
洮南县大茂好屯	36	34.3	10.2	4.7	18.1	24.0	4.3	4.3
敦化县三台山屯	50	23.5	7.8	6.0	17.1	24.9	11.5	9.2

① 乔启明:《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

② 如1935年山东赴东北移民的年龄结构中,20—40岁占65%,50岁以上的不到8%。参见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东方杂志》第43卷第14号(1947年)。



续表 4

村庄名称	农家(户)	1—10岁 (%)	11—14岁 (%)	15—17岁 (%)	18—30岁 (%)	31—50岁 (%)	51—60岁 (%)	60岁以上 (%)
磐石县冉家屯	40	24.2	10.2	7.9	20.0	24.2	8.4	5.1
榆树县余家烧锅屯	34	26.8	11.2	7.6	19.2	21.4	8.0	5.8
延吉县杨成村 AB 屯	49	27.8	9.3	7.2	23.4	21.0	7.6	3.8
庄河县金厂屯	38	31.4	8.0	4.7	19.3	23.7	4.7	8.0
凤城县西门家堡子屯	47	29.8	10.8	5.6	23.0	19.3	6.6	4.9
辽阳县前三塊石屯	77	28.8	6.5	5.9	20.7	19.5	7.1	10.8
辽中县黄家窝堡屯	59	28.6	8.1	6.2	22.3	22.1	5.7	7.0
盖平县陈家屯	57	24.7	7.6	7.3	24.5	21.6	6.9	7.3
新民县二道河子屯	91	27.5	9.8	4.7	18.2	21.9	9.0	9.0
梨树县家油房屯	40	31.3	13.9	7.7	10.4	25.5	4.2	6.9
西丰县德恩屯	39	32.4	12.3	6.1	17.6	19.8	6.7	5.1
海龙县孙家街屯	46	30.0	12.1	6.8	19.9	21.5	5.2	5.5
黑山县孙家窝棚屯	65	26.1	8.7	5.5	22.2	24.5	6.6	6.4
盘山县孟家铺屯	57	25.7	10.2	4.7	19.3	24.3	7.9	8.2
丰宁县选将营子屯	79	25.9	9.0	6.1	23.1	21.8	7.1	7.1
宁城县和硕金营子屯	74	28.7	6.9	3.4	19.2	29.2	5.7	7.2
“南满”地区	978	28.2	9.4	5.9	20.2	22.6	6.9	7.0
东北地区	1 776	27.7	9.0	5.5	22.0	22.6	7.2	6.1

资料来源: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农村实态调查》。

(五) 家庭经济身份

本文根据马若孟(R. H. Myers)的研究,将农村实态调查提供的农户经济身份按照主要经营方式划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非农、无业等6种类别。^①需要说明的是此经济身份仅反映了农户家庭的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并非土改时的阶级身份。

东北地区平原辽阔,土地肥沃,适宜开垦和耕地,一直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比重最大。根据东北各地方志和县志记载,晚清时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②即使到1930年,随着工业化发展,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根据《东北年鉴》的统计,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62.26%。表5给出了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家庭经济身份的结构特征,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家庭经营方式中以农业为主,非农仅占6.2%。而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中,自耕农比例最高,占到总比例的三分之一,其次为佃农和雇农,分别为20.8%、22.6%,地主仅占15.4%。从“北满”、“南满”不同地域来看:在“北满”地区,雇农比例最高为34%,其次是佃农和自耕农,分别占21.3%、20.4%。地主比重为16.4%,高出东北地区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非农比例仅占4.9%,低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而在“南满”地区家庭经营方式中,虽然也以农业为主,但非农占7.3%,高于“北满”地区2.4个百分点。在农户中,自耕农比例最高,高达

^① 满铁调查中主要根据土地经营方式把农户家庭划分为16类,其中,地主划分为8类,包括地主、地主兼自作、地主兼自作兼小作、地主兼小作、地主兼小作兼雇农、地主兼自作兼雇农、地主兼小作兼雇农、地主兼雇农;自耕农划分为4类,包括自作、自作兼小作、自作兼小作兼雇农、自作兼雇农;佃农划分为2类:小作和小作兼雇农;此外还有雇农和非农。这里我们主要根据马若孟的分类,简化为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和非农以及无业。它主要反映了农户的经济状况,如果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地租,则定义为地主;如果农户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耕种自己的土地,则定义为自耕农;如果农户的主要收入是耕种租来的土地,则定义为佃农。参见 Ramon H. Myers,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Villages of Manchuria during th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4, 1976, pp. 591—620.

^② 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第117页。



44.2%。“北满”地区和“南满”地区存在差异的原因:一是“南满”地区开发较早,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非农比例要高于“北满”地区;二是“北满”地区主要以农业为主,家庭经营主要与农业和土地相关。

表5 东北地区移民乡村社会家庭经济身份

地区	农家 (户)	地主 (%)	自耕农 (%)	佃农 (%)	雇农 (%)	非农 (%)	无业 (%)
海伦县后三马架子屯	52	15.4	23.1	34.6	21.2	5.8	0.0
望奎县后四井屯	38	15.8	18.4	21.1	44.7	0.0	0.0
绥化县蔡家窝堡	45	22.2	20.0	11.1	40.0	4.4	2.2
庆城县张家烧锅屯	67	10.4	9.0	31.3	43.3	1.5	4.5
呼兰县孟家屯	51	9.8	17.6	25.5	39.2	5.9	2.0
巴彦县西太平庄屯	42	19.0	21.4	0.0	54.8	4.8	0.0
青冈县董家店屯	30	6.7	36.7	30.0	20.0	6.7	0.0
兰西县石家围子屯	42	23.8	31.0	19.0	21.4	4.8	0.0
安达县正四家子屯	24	20.8	8.3	8.3	58.3	4.2	0.0
肇州县张家大围子屯	62	17.7	11.3	6.5	54.8	9.7	0.0
富裕县七家户屯	19	15.8	26.3	10.5	42.1	5.3	0.0
富裕县李地方自屯	13	0.0	38.5	38.5	23.1	0.0	0.0
讷河县孙家井	34	8.8	23.5	26.5	38.2	2.9	0.0
拜泉县王殿元屯	33	18.2	15.2	48.5	12.1	6.1	0.0
明水县郭殿仁屯	43	27.9	9.3	18.6	41.9	2.3	0.0
克山县程家油房	18	33.3	0.0	38.9	22.2	5.6	0.0
克山县胥家屯	25	20.0	20.0	36.0	20.0	0.0	4.0
克山县李家店屯	9	11.1	11.1	55.6	22.2	0.0	0.0
龙镇县帮办屯	34	11.8	5.9	32.4	44.1	2.9	2.9
璦琿县松树沟屯	63	3.2	54.0	7.9	17.5	15.9	1.6
桦川县陆家岗屯	32	25.0	18.8	3.1	3.1	0.0	0.0
富锦县岳家屯	22	40.9	13.6	18.2	27.3	0.0	0.0
“北满”地区	798	16.4	20.4	21.3	34.0	4.9	1.0
洮南县大茂好屯	36	33.3	8.3	36.1	13.9	8.3	0.0
敦化县三台山屯	50	4.0	30.0	54.0	6.0	6.0	0.0
磐石县冉家屯	40	12.5	5.0	70.0	10.0	2.5	0.0
榆树县余家烧锅屯	34	29.4	32.4	17.6	20.6	0.0	0.0
延吉县杨成村 AB 屯	49	16.3	26.5	51	4.1	2.0	0.0
庄河县金厂屯	38	26.3	31.6	23.7	10.5	5.3	2.6
凤城县西门家堡子屯	47	12.8	25.5	27.7	8.5	23.4	2.1
辽阳县前三块石屯	77	16.9	67.5	5.2	3.9	6.5	0.0
辽中县黄家窝堡屯	59	6.8	25.4	3.4	61.0	1.7	1.7
盖平县陈家屯	57	3.5	80.7	5.3	1.8	8.8	0.0
新民县二道河子屯	91	14.3	38.5	15.4	19.8	12.1	0.0
梨树县家油房屯	40	15.0	42.5	22.5	10.0	10.0	0.0
西丰县德恩屯	39	30.8	10.3	46.2	2.6	10.3	0.0
海龙县孙家街屯	46	23.9	15.2	39.1	21.7	0.0	0.0
黑山县孙家窝棚屯	65	12.3	66.2	4.6	13.8	3.1	0.0
盘山县孟家铺屯	57	10.5	84.2	0.0	5.3	0.0	0.0
丰宁县选将营子屯	79	12.7	63.3	6.3	7.6	10.1	0.0
宁城县和硕金营子屯	74	5.4	63.5	4.1	13.5	13.5	0.0
“南满”地区	978	14.5	44.2	20.4	13.3	7.3	0.3
东北地区	1776	15.4	33.5	20.8	22.6	6.2	0.6

资料来源: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农村实态调查》。



四、东北乡村社会移民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20世纪30年代东北乡村社会移民家庭人口结构呈现出:家庭规模大,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占有比例以及男女性别比例较高,年龄结构年轻化等特征,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北地区乡村社会在家庭人口结构方面具有这样的特征呢?

我们认为东北地区的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与其他地区一样,深受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但另一方面东北地区深受边疆移民文化的影响,具有较为鲜明的边疆特征。其中,经济因素是维持大家庭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才有能力生育更多的子女,从而有利于维持大家庭生活。^①东北地区作为移民开发地区,这种经济条件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移民定居时间长短可能对农户家庭人口结构产生影响。因为东北地区作为边疆后开发地区,农户移民定居时间越晚,经济越无保障,移民风险越高。因此,移民定居时间差异可能是影响农户家庭人口结构的潜在因素。二是东北地区虽然开发较晚,但是东北地区是近代工业化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南满”地区工业较为集中。因此大城市对周边乡村的经济辐射效应较为突出,距离大城市越近,潜在的非农就业机会也将更多。除经济因素外,东北地区的边疆文化特征也是影响家庭人口结构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东北地区人多地少的边疆地区特征。东北地区的这种特殊的要素禀赋特点,也使得东北地区拥有与华北、华东地区迥异的家庭人口结构特点。

由于本文仅是考察影响东北地区移民乡村社会农户家庭人口结构的潜在相关因素,而非因果分析。因此在表6我们分别给出了农户移民定居时间、村庄到大城市距离、村内拥有土地面积以及地区固定效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②

从表6面板A第一列可以看到,作为家庭财富拥有量的土地面积对数值的估计系数为1.1,且统计显著,农户家庭拥有的土地财富每增加1%,家庭人口规模增加1.1人。这一方面表明,中国传统社会农户财富的人口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社会土地生产对家庭规模的需求。其次,度量近代工业化影响的代理变量对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越靠近大城市的家庭拥有潜在更多的经济机会,也增加了家庭规模扩大的可能。此外,我们发现东北地区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北满”地区,近代工业化对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要小于“南满”地区(表6面板B和面板C)。之所以造成这一不同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南满”地区相对于“北满”地区而言,开发时间早,工业化程度水平较高,因此对“南满”地区家庭规模影响更大。

关于家庭性别比例的考察在表6面板A第二列给出。同样可以看到,农户拥有土地面积对农户家庭性别比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家庭拥有的土地财富越多,农户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家庭内部性别结构也越趋于平衡。此外,从移民因素来看,移民定居时间对家庭性别比起到重要影响,发现移民家庭移民定居时间越久,家庭性别比例越平衡。这一结果恰恰体现了典型的移民社会特征。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近代工业化却对东北地区农户家庭性别结构没有显著影响。而且,通过对比“南满”与“北满”地区的回归结果发现,“北满”移民因素对农户家庭性别结构的影响要比“南满”更强,由于“北满”地区开发较晚,因此更多的新移民定居在“北满”地区,这一结果恰恰体现了东北地区移民开发对家庭性别结构的重要影响。

在家庭年龄结构方面,表6面板A第三列给出了相应的分析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农户土地财产数量对农户家庭年龄结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家庭财富越多,农户家庭年龄结构越趋于

① 余新忠:《中国家庭史·明清时期》第4卷,第54页。

② 其中,农户移民定居时间为该农户迁移到当前村庄定居时间距离调查时间的对数值;农户所在村落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是主要农户所在县到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长春地理距离的对数值;村内拥有土地面积是农户所在村内拥有土地面积的对数值。



正常水平。而且通过对比“南满”和“北满”地区可以看到,“北满”地区与“南满”地区相比拥有更加年轻化的年龄结构。

最后,表6面板A第四列和第五列给出了关于家庭类型和职业结构的probit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移民拥有的土地面积对家庭结构类型和经营方式具有显著的影响,移民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多,该家庭从事农业的概率也越高,成为核心家庭的可能越低。同样地,我们发现,“南满”地区比“北满”地区拥有更高比例的非农家庭。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尽管东北地区的家庭人口结构会受到诸如经济社会发展等众多因素影响,但边疆移民特征依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近代东北地区的开禁,工业化的发展,给东北乡村社会创造了发展的机遇,进而也决定了其特殊的家庭人口结构特征。

表6 东北乡村移民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

面板 A:东北地区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人口规模	性别比	中青年比例	核心家庭	非农
解释变量					
移民定居时间(log)	-0.111 (0.071)	-0.032 [*] (0.018)	-0.003 (0.004)	-0.010 (0.025)	-0.151 ^{***} (0.043)
到大城市的距离 (log)	-0.313 ^{***} (0.105)	0.003 (0.028)	0.003 (0.006)	0.110 ^{***} (0.040)	0.028 (0.070)
村内拥有土地面积 (log)	1.106 ^{***} (0.096)	-0.072 ^{***} (0.013)	-0.007 ^{**} (0.003)	-0.242 ^{***} (0.023)	-0.457 ^{***} (0.105)
是否为“北满”地区 (是=1)	1.057 ^{***} (0.222)	0.053 (0.051)	0.029 ^{***} (0.011)	-0.160 ^{**} (0.071)	-0.449 ^{***} (0.128)
常数	6.809 ^{***} (0.628)	1.433 ^{***} (0.167)	0.508 ^{***} (0.037)	-0.421 [*] (0.239)	-0.910 ^{**} (0.414)
观测值	1615	1551	1615	1615	1615
R-squared	0.152	0.023	0.012		
面板 B:“北满”地区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人口规模	性别比	中青年比例	核心家庭	非农
移民定居时间(log)	-0.070 (0.154)	-0.066 [*] (0.034)	0.001 (0.007)	0.039 (0.048)	0.039 (0.085)
到大城市的距离(log)	-0.288 ^{**} (0.153)	0.003 (0.037)	-0.010 (0.008)	0.121 ^{**} (0.054)	0.054 (0.102)
村内拥有土地面积 (log)	1.213 ^{***} (0.165)	-0.077 ^{***} (0.019)	-0.009 [*] (0.005)	-0.283 ^{***} (0.035)	-0.363 ^{***} (0.106)
常数	7.536 ^{***} (0.884)	1.574 ^{***} (0.218)	0.590 ^{***} (0.045)	-0.722 ^{**} (0.311)	-1.922 ^{***} (0.615)
观测值	723	697	723	723	723
R-squared	0.137	0.025	0.009		
面板 C:“南满”地区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人口规模	性别比	中青年比例	核心家庭	非农
移民定居时间(log)	-0.109 (0.076)	-0.020 (0.021)	-0.005 (0.005)	-0.033 (0.030)	-0.215 ^{***} (0.053)
到大城市的距离(log)	-0.396 ^{***} (0.135)	0.003 (0.042)	0.021 ^{**} (0.010)	0.116 [*] (0.061)	0.003 (0.098)
村内拥有土地面积 (log)	1.005 ^{***} (0.107)	-0.067 ^{***} (0.019)	-0.004 (0.004)	-0.211 ^{***} (0.032)	-0.507 ^{***} (0.150)
常数	7.367 ^{***} (0.791)	1.385 ^{***} (0.244)	0.413 ^{***} (0.056)	-0.406 (0.350)	-0.596 (0.547)



续表 6

面板 C:“南满”地区

	(1)	(2)	(3)	(4)	(5)
观测值	892	854	892	892	892
R-squared	0.157	0.017	0.010		

说明:1、模型 1—3 为 OLS 模型,模型 4—5 为 Probit 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人口规模、性别比、中青年比例、是否为核心家庭、是否为非农;2、解释变量包括移民定居时间(log)、村内拥有土地面积(log)、村庄到大城市的距离(log)、所在村庄是否为北满地区(是=1);3、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五、结论

本文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伪满洲国农村实态调查数据对近代东北地区传统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在家庭人口规模方面,东北地区家庭平均人口为 6.62 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家庭类型结构方面,东北乡村移民家庭中核心家庭比重为 41.8%,直系家庭比重为 31.9%,复合家庭比重为 17.5%。在性别比例方面,东北地区总体男女性别比与全国基本持平,但是“北满”地区家庭性别比为 113,“南满”地区家庭性别比为 103,“北满”地区作为后开发地区,家庭内部性别比要高于“南满”地区,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在年龄结构方面,15—50 岁的青壮年占有较高比重,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家庭内部拥有更高的劳动力比例;在经济身份方面,农业依然是主要就业方向,自耕农占有较高比例,但“南满”和“北满”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整体来看,东北地区传统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既有与全国相似的特点,也存在自身独特的特点。在考察影响家庭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时,发现经济和移民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人口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类型结构以及经济身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对东北地区移民家庭人口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丰富了现有关于近代中国家庭规模和人口结构方面的研究,并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近代边疆地区乡村社会移民家庭的认识和理解,揭示了边疆文化对家庭结构、人口等方面的作用。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Household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odern Northeast Rural China

Li Yajing, Li Nan

Abstract: Based on a household-level dataset surveyed by the Southern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in the 1930s northeast rural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ousehold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rural society. We find that the household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s a host locality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features. In the household type and family size, the average family siz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is larger than other regions, and lineal families and complex families accounted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As for the sex ratio, the sex ratio in northeast China is almost equal to that in the whole China, but families in north Manchuria are characterized by male-biased sex imbal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e structure, families have higher labor force rates. In the economic status, although agriculture is the main job, the rate of non-agricultural workers in south Manchuria is higher than in north Manchuria. In addition, we also fi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ontier economy and migr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ffecting the household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household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 the rural northeast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ut also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ural society in modern frontier.

Key Words: Rural Society, Manchuria Migrants, Household Demographic Structure

(责任编辑:高超群)